热点透析

统一俄罗斯党内的三个政治平台

□李兴耕

统一俄罗斯党建党以来，党内一直存在不同的思想倾向。从2012年起，在原有俱乐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社会平台”“爱国主义平台”和“自由主义平台”三个政治平台，分别代表了左、中、右三种不同倾向，在党的决策过程和政治活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演变过程

早在2005年，统一俄罗斯党内就形成了“自由保守主义”“社会保守主义”和“国家爱国主义”三个政治俱乐部。三个俱乐部的代表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签署了“统一俄罗斯党政治俱乐部公约”，宣称各派都“忠于党的世界观及其基本价值、理想和纲领目标”，“拥护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提出的直到2020年的俄罗斯发展规划，并为实现这一规划积极努力，贡献力量”。公约宣称，鉴于党内对如何实现国家面临的各项重大任务的道路和方法持有不同观点，应切实展开思想理论工作，进行自由辩论。同时必须遵守党的章程和纲领。一旦党的领导机关通过决议，每个成员都必须执行。该党最高委员会主席格雷兹洛夫也对党内成立三个政治俱乐部表示肯定，认为这有助于党内进行广泛讨论。

2012年3月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后指出，统一俄罗斯党想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必须提高统一俄罗斯党的生命力和政治竞争力，向广大选民表明，它选择的国家发展道路对于当前时期的俄罗斯是最合适的。为此统一俄罗斯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改建政治平台。

2012年4月初，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会主席团书记谢尔盖·涅维洛夫指出，统一俄罗斯党作为俄罗斯第一大党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面临一系列新任务。党一直把发扬党内民主和展开辩论作为工作基础。考虑在党内建立几个意识形态平台，使党的各个团体可以表达并捍卫自己的政治观点、社会价值和经济主张。政治平台不仅要提出和讨论最重要的问题和最紧迫的事情，而且要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政治平台的多样性可以保证党的意识形态的总方向，实行合理的政治集中，在互相有矛盾的各种利益之间保持平衡，把各不相同的意见整合成统一的党的纲领。在选择继续发展党的意识形态道路上保持各种观点的平衡十分重要，既不应倒向左边，也不应倒向右边。2012年4月6日，涅维洛夫发表“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平台：发展的意识形态”的讲话，特别强调建立意识形态平台是为了发展党内民主。要保持各种观点的平衡，使社会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形成有效的互动机制。

2013年1月23日，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会主席团副书记安德列·伊萨耶夫在三个政治平台的联席会议上说，不同平台反映了广大党员和支持者的思想观点。各派的思想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都是爱国的、有意义的和重要的。党内确立了平台对话的机制，重要的是通过辩论进行沟通，从而找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办法。

政策主张

自由主义平台。2012年3月，自由保守主义俱乐部协调人弗拉基米尔·普里金宣称，统一俄罗斯党作为一支进步的中右力量，应捍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坚持右翼保守主义方向，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2013年2月4日，自由保守主义俱乐部改组为自由主义平台。弗拉基米尔·普里金、维克多·祖巴廖夫和瓦列里·法捷耶夫三人被推选为该派协调人。自由主义平台宣称：如果没有自由思想，就不可能实现全体俄罗斯公民的繁荣和公正，繁荣俄罗斯的形象应是自由国家的形象；只有通过有能力保卫自由不受内部和外部威胁的强大国家，才能实现自由思想；民族资产阶级是一切自由的最可靠支柱；大众媒体应致力于促进实现民族团结的任务；自由主义是根据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确定国家发展方向的思想，要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在一起。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内容是：自由、私有制、公正、团结、主权。同时该派对目前流行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潮提出批评。

社会平台。社会平台是在社会保守主义俱乐部基础上组成的，最初的协调人是安德列·伊萨耶夫。2012年该政治俱乐部改组为社会平台后，由统一俄罗斯党最高委员会执行局成员、国家杜马党团副主席奥列克·莫罗佐夫任协调人。后来，莫罗佐夫转到总统办公厅工作，从2012年8月10日起党的总委员会副书记、国家杜马副主席谢尔盖·热列兹尼亚克担任社会平台协调人。

社会平台与自由主义平台对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定位持不同观点。伊萨耶夫宣称，我们坚持中左立场，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福利，不应转向自由主义，而应成为更加关注社会的力量。他认为，在选举中投票赞成统一俄罗斯党的大多数选民是中产阶级代表、熟练工人、工程师、公务员、军人、退休者，他们都支持党的中左立场。他声称，多数党员都拥护社会保守主义。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会主席团副书记尤里·舒瓦洛夫认为，统一俄罗斯党应成为具有明确社会倾向的俄罗斯保守主义政党。莫罗佐夫也宣称，统一俄罗斯党应采取中左意识形态。“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在政治上团结一致，在意识形态上保持多样性。”热列兹尼亚克指出，社会平台要成为有关社会领域的立法的主要倡议者，并运用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帮助制定有效的立法倡议。可见，社会平台带有一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它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平台，也与西欧社会民主党存在明显差异。

爱国主义平台。爱国主义平台采取介于自由主义平台和社会平台之间的中间立场。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家杜马安全与反腐败委员会主席伊琳娜·亚罗瓦娅担任该派协调人。她认为，统一俄罗斯党自建党起就是一个联合的、团结的党。左的和右的意识形态将会使社会分裂，互相对立。党既不应该向左转，也不应该向右转，而是要在“行动中的爱国主义”基础上把社会团结起来，向前迈进。她强调，尽管统一俄罗斯党遭到这样或那样的批评，可能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党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站在一起，顺利地实行了发展国家的政策，既借鉴自由主义思想，也借鉴社会思想。现在俄罗斯需要联合起来争取胜利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国家爱国主义。只有在国家爱国主义基础上，才能实现发展国家、继续进行现代化的战略。

具体职能

展开讨论的平台。统一俄罗斯党内的各个政治平台通过举行各种圆桌会议和辩论会，讨论有关国计民生和党的发展的各种问题，提出各种方案和建议。

联系不同社会群体的桥梁。三个政治平台代表了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的诉求。自由主义平台主要代表企业主群体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致力于优化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平台主要代表普通劳动者、工会会员、科技人员、教育工作者及退休人员等的呼声，致力于改善社会保障体制；爱国主义平台代表各类强力部门工作人员、军人、老战士及广大爱国者的诉求，致力于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和安全。

立法倡议推动者。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各级地方立法会议以及政权机关中都有各平台的代表，他们积极参与立法活动和行政管理，在各自的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的倡议和法案，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其中许多倡议和法案经国家杜马及各级立法会议讨论通过，成为国家法律或地方性法规。

选举活动参加者。在总统选举以及各级政权机关、国家杜马和地方立法会议代表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的候选人名单，首先要在党内初选，各个平台都有权参加这些初选活动。统一俄罗斯党各个平台与全俄人民阵线是密切合作的伙伴，在议会选举以及重大议案表决时采取一致行动。

从最近两年的实践来看，统一俄罗斯党的三个政治平台在加强党内各派团结、提高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促进党与社会群体的对话和沟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三个政治平台都宣称拥护普京路线，但各派之间的观点分歧也相当明显。统一俄罗斯党今后能否发扬党内民主，有效地协调整合各个平台的力量，避免内耗和组织分裂，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关系到党的兴衰存亡的重大课题。

环球瞭望

荷兰的“生态民主”

□马利军

20世纪80年代，面对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荷兰开始了新一轮的环境治理转型。目前，荷兰和德国一样，都是世界上环境标准、环境管理和环境法制最严格、最完备的国家之一，荷兰的《环境管理法》与法国的《环境法典》和瑞典的《环境法典》一样，是世界上综合性最强的环境法之一。同时，荷兰和瑞典、丹麦是最早实行生态税改革的国家。荷兰能够在生态治理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得益于荷兰拥有高素质、教育程度高、主观能动性高的公民，其次得益于该国具有通过对话和协作解决问题的传统。换言之，荷兰在环境保护方面走出了一条顶层设计与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相结合的“生态民主”道路。

生态环境保护注重顶层设计

20世纪80年代之前，荷兰曾进行过几次大的环境治理战略，但治理结果与预期并不一致，这一方面使得公众越来越觉醒，来自工商界和绿色运动的压力逐步增强，另一方面也使得政府逐步意识到环境治理不能寄希望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末端治理方式和短期治理措施，而必须依赖于战略性和系统性强的长期环境治理规划，因此荷兰的环境治理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长远规划性。荷兰环境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荷兰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有规划性的、综合性强的创新政策。

通过整理环境治理转型之前的各种单独的以及短期的法律和法规，该国政府逐步形成并实施了一系列战略性强的《环境管理法》和《国家环境政策计划》，并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补充、修改和完善。换言之，荷兰环境治理采用的是一种战略管理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在可持续发展的愿景下不断设立目标、规定达标期限、进行实时监控和阶段总结，进而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环境治理道路，成为其他国家环境治理的楷模。

环境治理始终体现各阶层协商原则

在进行一系列环境治理转型的同时，以往的实践教训使得荷兰政府逐步意识到：单纯地注重环境治理并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而实现这种双赢，扭转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不应该将政府作为治理环境的唯一主体，而必须依赖于政府、公众以及工商界等社会各阶层的合力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荷兰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将环境治理过程中的顶层设计和各阶层协商统一起来。政府对待工商界普通公众的态度也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规制，而是以他们为目标群体，并开展广泛深入的立法协商活动。无论是不断完善的《环境管理法》，还是《国家环境政策计划》均体现了政府与社会各阶层民主协商的原则。

通过这一举措，一方面公众和工商界等各阶层群体更好地参与了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过程，进而主动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重大政策均是在民主协商基础上制定的，因而面对各种环境保护和治理问题时，企业和公众自身的责任负担也会大幅度减小。与此同时，该举措可以使社会各阶层对自身生产和消费环节所存在的环境问题更为了解，由于更知情，企业可以修正行为或流程，从而向更亲环保的方向努力，普通公众也进一步增强了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感。

社会各阶层以多样化的方式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荷兰的生态民主道路以提高社会各阶层的责任感为突破口，以互动的合作式管理模式代替了自上而下的指挥控制式管理模式，通过自愿式契约、能源税、生态标签等多种形式，逐步将各类环境问题整合到一个连贯的、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政策框架中，进而实现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

在工商界层面，荷兰政府开创了自愿式契约模式。这种契约形式是在政府与企业共同商讨基础上形成的文本，因此，它一方面契合了政府进行环境治理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也使得企业在生产产品和服务时，有了可行性强的环境保护参照标准，进而实现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由于该契约是在共同商讨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它不仅促进了全国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而且也使得企业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灵活度，从而很好地激发了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也使得这种以自愿为基础的实现形式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参与度。与此同时，该契约的自愿性和商讨性特点，也使得政府和企业彼此之间不用互相揣摩猜测，信息成本大幅度降低，进而有助于政府和企业制定战略性发展计划和长期投资规划。

在普通公众层面，荷兰政府较完善地提出并实施了生态税这一税种，有效引导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这一税种最显著的特点是：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各关键行为主体所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建立在共识机制基础上的。正因为这一特点，该生态税具有了广泛的特殊条件规定，有效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荷兰的住房、自然规划和环境部以及经贸部较早创立了“环境检查基金会”，并由其创建了荷兰生态标签。该基金会的最大亮点是其组成人员的广泛性。基金会由来自政府、消费者、生产商、零售商、贸易和环境组织的代表组成，负责对产品是否符合绿色标签定义的标准做出全面评估。

整体看来，荷兰的生态民主道路有以下两大鲜明特点。

一是荷兰的生态民主责任明确，分工科学。各级政府和各阶层群体在共同协商基础上，设定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长期目标，然后根据这一战略性目标，由中央政府统筹布局，分阶段实施，清晰划定各行为主体的相应责任，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保证各阶层群体享有充分的参与性，进而顺势而为地增强了各参与主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是荷兰的生态民主具有合作协调和机动灵活的特点。各级政府、各经济行为主体、教育和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在荷兰的环境治理中如同一个庞大的生态环境保护团队。这一团队首先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然后寻求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在面向未来愿景的共同目标下通力合作，因此可以在整体可持续性目标的顶层设计框架下及时适应各种新情况、新理念，接受各种新信息、新知识，解决各种新问题、新障碍，逐渐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

透析瑞典公共养老基金投资

□郭 林

瑞典名义账户养老计划是否存在基金投资？很多人对该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应理性审视此观点。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主体往往是社会保险基金，而后者主要为公共养老基金。瑞典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体系由名义账户、基金个人账户和保证养老金三项计划构成。在这一以名义账户为主体的制度实施之前，瑞典旧公共养老金制度留存了足够支付五年养老金的缓冲基金，这笔巨额基金为新制度的顺利推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需要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运营，以实现保值增值。同时，在瑞典新公共养老金制度体系中，发挥补充作用的基金个人账户的积累亦需选择有效的投资工具，以应对贬值风险。

瑞典养老基金投资现状

参保者向瑞典名义个人账户的供款进入六个缓冲基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其他），主要用于支付同期退休者的养老金，亦与旧制度存留基金共同形成了结余。近年来，缓冲基金结余为6000多亿瑞典克朗。参保者向基金个人账户供款和投资收益所形成的积累总额约为两万亿瑞典克郎。名义账户的收益率主要依据经济活动人口的平均收入增长率来确定，其对每个瑞典国民而言是一致的。资本市场主要通过缓冲基金的投资来对名义账户制度的财务施加影响。瑞典缓冲基金超过一半金额选择的投资工具是股票，因此，其深受经济态势的影响。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斯德哥尔摩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价值损失比例超过了40%，这给缓冲基金带来很大消极影响，第一至第四、第六和其他缓冲基金分别减少了479.67亿、548.99亿、446.20亿、433.45亿、31.08亿和0.92亿瑞典克郎。为了实现制度财务平衡，缓冲基金缩水使得随后年度名义个人账户的记账收益率有所降低。

基金个人账户的积累大部分投资于股票市场，这使得瑞典国民在该方面的收益率存在较大差异。在税收评估完成之前，基金个人账户的积累由PPM（公共清算中心）购买有息资产进行投资。当PPM确定参保者个人账户上的养老金信用之后，则购买参保者个人所选择的工具进行投资。如果参保者并未自行作出投资选择，其个人账户积累额则按缺省的方案进行投资。

1995年以来，瑞典基金个人账户积累的投资收益率总体为正值，特别是在2005年达到了30.5%。但是，考察投资收益率数值，必须结合整个经济形势，才可把握其实质。一个经济周期内前期的正投资收益率所形成的积累很可能会在经济或金融危机期间受到高比率侵蚀，使得积累额的绝对量损失很大。

瑞典属于开放经济的小型国家，其基金个人账户积累约50%投资于国外股票市场，仅约20%投资于瑞典股票市场。PPM指数用于衡量基金个人账户积累投资额在一定期间之内的变动情况，又称时间收益。2004—2007年，PPM指数要远低于斯德哥尔摩股票交易市场的收益指数，但这一情况在2008年发生了很大改变，这与很多投资者将其基金个人账户积累投资于国外股票市场密切相关。

即使参保者退休，也并不意味着其基金个人账户投资结束。对于退休恰逢经济不景气的国民，可在之后用其积累购买基金保险，这是大部分瑞典国民的选择；对于少数选择传统保险的退休者来说，可以获得有保证的退休收益，但挽回因退休于经济不景气时期而形成损失的力度不大，不过其可获得PPM支付的准许退款。

需要指出的是，瑞典名义账户的收入指数化收益率与基金个人账户的投资收益率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互补。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尽管基金个人账户的收益率为负值，但名义个人账户实际收益率的增加使得整个养老金制度体系的收益率总体较佳。

注重国民养老基金投资教育

当前很少有瑞典人在工作期间对自己的养老基金主动进行投资。瑞典政府认为，投资经验和水平与教育、收入以及财富紧密相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缺乏经验和水平较低的投资者不能从投资于更有效率的工具而获得更高的收益。除了充足的信息和良好的教育，他们需要养老金制度提供的优良备选投资组合，其应与投资者的年龄紧密相关，为年轻人提供集中于股票或股票基金的组合，为年龄大于50岁的国民（包括退休者）提供稳定性较强的付息证券比例较高的组合。当前，瑞典基金个人账户积累投资的默认备选投资组合缺乏这种年龄特征，将来会努力弥补这一缺憾。

国民决定自行投资其养老基金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投资组合的选择要有全局眼光，即每个投资者要通盘考虑自己的公共养老金和其他资金或资产，来选择符合自己风险偏好的投资组合。

第二，一个人的收入来源与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关系是其投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在金融部门工作的国民应对自己的养老基金投资更加谨慎。为了规避风险，他们需尽少投资于股票市场。否则，他们很可能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时期，同时失去工作和大笔养老基金积累。

第三，国民应谨慎将养老基金投资于其供职公司的股票。很多人认为自己对本公司十分熟悉，特别是本公司的财务信息对称性强，故愿意选择本公司股票进行投资。但应看到，一旦供职公司破产，他们会失去收入来源和投资的养老基金。

需要澄清两个误区

误区一：名义账户制是能够避免养老基金投资的个人账户机制。很多人认为，名义账户为现收现付制度，无需进行养老基金投资即可实现制度的可持续运行。这种认识未能有效把握现收现付养老金机制收益率的实质，是将名义个人账户孤立而不考虑其外因素的观点。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的现收现付计划，还是名义账户制度，尽管不需要本身资金的投资运营，但其基于收入指数化的收益规则面对严峻人口老龄化状况，一般需要外部资金的支持，才能有效发挥凯切保障国民养老权益的作用。从现代社会保险的政府、社会经济组织和国民个人等多方分则原则看，当现收现付制度所能提供的养老金水平不够充分之时，政府财政有责任对养老基金提供足额补贴。但现实中的政治程序和政策制定很可能无法使得这笔资金及时到位，故更可行的做法是，建立一项储备基金，来与传统的现收现付或名义账户制度互动，协同发挥支付养老金的作用。

考察瑞典公共养老金制度，不应仅盯住名义个人账户而忽视储备基金的作用，二者实为一个整体。处于现行瑞典公共养老金制度体系主体地位的名义账户本身没有基金积累，面对高水平的老年赡养率，其收入指数化的“计息”规则需要一项基金作为源头之水，而旧公共养老金制度留存的巨额缓冲基金则发挥了这一作用。也就是说，名义个人账户与缓冲基金密切相关，只有切实实现二者的协调与配合，方可实现制度的可持续运行。瑞典是世界上实行名义账户计划最为成功的国家，而这一计划整体尚不能脱离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其他国家的名义账户制度自不待言。

误区二：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必然能为每个参保者的将来提供足额退休金。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养老金制度应是一个能为参保者提供具有安全性和稳定性退休收入的制度，而不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赢家和输家并存的制度。面对经济或金融危机，瑞典公共养老金的缓冲基金和个人账户积累的绝对额受到了很大损失，给国民养老带来消极影响。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将养老基金投资于高风险和高收益工具（如股票）的风险，不能对资本市场持盲目乐观的态度。切忌用国际资本市场或一些国家资本市场一定时期高水平平均投资收益率的经验来推断养老基金运营必然取得高额收益。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曼昆所言，资本市场“过去的成就并不能保证将来的结果”，我们不应仅仅看到股票市场在某些国家某些时期的高额投资收益率，更须牢记经济或金融危机时期的高额负投资收益率。

具体到个体而言，在自行作出投资选择的参保者中，投资收益率会因其投资经验和水平的差异而出现较大差别，这极易形成赢家和输家并存的状况。总之，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并不必然为每个参保者的将来提供足额的退休金，而是存在着巨大风险。在生产效率较为稳定的一定时期内，面对无法避免的养老基金投资，具体国家应根据其资本市场和国民素质等状况，从多方分责角度出发，有效协调政府和个人在投资运营与损失补贴等方面的作用，为保障国民的养老权益提供支撑。

西方社会